

回顾东昌历史上的医师：

古城历代多名医 奇方良药治顽疾

文/片本报记者 杨淑君



古城九旬老人朱成德回忆，他小时候，家里有人生病，就派人去请观前街的葛赞廷先生。葛先生并不收诊断费，他家就留先生吃顿饭。那个年代，中医诊病都不要钱。随着老人的回忆，清末以来的名医仿佛从历史中走来。



古城复建景点 万寿观基本竣工



复建的万寿观。

本报聊城11月17日讯(记者 杨淑君) 古城复建景点、传统道教建筑、以“仙阁云护”位列东昌八景的万寿观，近日完成油漆、彩绘工作，正进行路面工程，预计年底前全部完工。

17日上午，记者在现场看到，万寿观的主要建筑山门、大殿、昊天阁都已基本完工，工人们正在进行万寿观前的路面施工。

据悉，万寿观山门朝南，为殿堂式、单檐歇山顶，大殿为重檐歇山顶，皆面阔五间，飞檐斗拱，正脊两端均有彩色吻兽对峙，房坡边缘铺制淡绿色琉璃瓦，中为灰色筒瓦。

从山门进入，穿过宽阔大殿，最后一进院落正中就是摩云凌霄的昊天阁。它二层楼阁、三层飞檐，五间正室，一层、二层四周均有走廊环绕，上层走廊围以木栏。顶部与大殿相似，绿色吻兽、琉璃瓦、翘角及灰色筒瓦相映生辉。

据《聊城县志》等记载，万寿观前身是房老庵。明洪武二十九年(1396年)，由后军都督金荣奏请更名为万寿观。观内主要有昊天阁、三清殿、郁罗萧台、九龙钟特室等建筑。昊天阁楼上供奉玉帝神像，楼下供奉天官、地官、水官三座神像。

三清殿后墙上有清代状元邓钟岳手书“阆苑瀛洲”四个大字，每字大逾丈余。昊天阁的第一层中央悬挂着乾隆皇帝南巡来东昌时，御笔所题的“仙阁云护”四个大字。

在昊天阁的后面有一座“特室”，内有“九龙钟”挂在梁上，被视为镇观之宝。九龙钟高达2米，重约万斤，为紫铜加合金铸造而成，外表金光耀目。其周身雕刻九条飞龙，龙形各异，或戏珠，或昂首欲飞，神态逼真，活灵活现。九龙钟铸造于明正德十三年(1448)，传说九龙钟下，还曾有一只铁铸的黑虎，蹲在地上，昂首仰视，叫做“抬头黑虎望金钟”，属于观中的奇景。

每日佛晓，主持道士登高敲钟28下，十里八乡都能听到。1938年聊城沦陷后，万寿观主持道士安排将钟楼及下面的特室以砖封上。1942年，伪知县举办祈雨活动，主持道士被迫敲响九龙钟。钟声被日军司令千野注意，后来将九龙钟劫夺运往日本。

据老居民回忆，民国后期万寿观已经残缺，犹如破篷，木门也被卸掉，有一个老道士住在观东侧的小院里。万寿观拆毁于聊城解放初期，1949年聊城郁光小学(今实验小学)成立时所建教室，就采用了拆除万寿观的木料。

万寿观侧古时曾有戏楼，戏楼后来塌掉，仅余大约两米高的戏台，戏台以北是万寿观广场。这里经常说书、唱戏，广场上热闹非凡。范筑先领导聊城人民抗战时，万寿观广场成为宣传抗日的集会场所，经常上演抗日剧目。部队打了胜仗，还在这里开庆祝大会，奖励立功的战士。

万寿观周围自然风光十分古朴而优美，计有四片水坑。观坑长年积水不涸，居民在其间植藕，夏日碧荷盈池，清香怡人。此时若登上昊天阁环顾四周，可见波光潋滟，绿柳垂岸，鸟飞蝶舞，燕语呢喃，顿感心旷神怡。

此外，据工作人员介绍，万寿观布展设计工作已经启动，并且完成初稿，正在征求意见和改进之中。



古城保护改造重现旧时风貌。 本报记者 邹俊美摄

医德：

有仁心得仁术 不为官为良医

朱成德说，葛赞廷诊断完病，开个方子，让人去药店买药。葛赞廷医术高，不只是对他家不收费，对贫富一视同仁，在坊间享有声望。

朱成德说，其实那个年代，中医看病都不收钱，不把看病当作挣钱谋生的手段，只是本着积德行善、治病救人的心理，为民众做点好事。他们各有别的生计。清末民初东昌府城内的胡煜堂、孙辅臣、王省三、王子良都是如此。当然，自己开药铺的例外，药费里可以挣钱。

王子良在观后街以开澡堂为生，字号“德和园”，店内陈设古香古色。看病的都到澡堂来找他，他诊断后开个药方，从不收诊费，而药方往往有奇效，药到病除。

古棚街的胡煜堂则以中医外科见长。他生于道光八年(1828)，自幼苦读诗书，更喜读医籍，通晓《外科精要》、《外科大成》、《外科正宗》、《医宗金鉴》等。擅治各类痈疽，有独特秘方熬制成的特效膏药。

胡煜堂给贫苦人家治病，向来分文不取。同治年间，曾给山东巡抚丁宝楨医治毒疮。丁宝楨病愈后，亲笔写下“唯有仁心得仁术，不为良相作良医”的对联相赠。此联被其后人珍藏数十年，在“文革”初，被作为“四旧”焚毁。外科秘方于其孙辈失传。胡煜堂病逝于光绪二十九年(1903)，享年75岁。

楼东大街的梁柱宸，出身中医世家，精于内科杂病诊治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他受聘聊城地区人民医院筹建中医科。梁先生诊病不拘泥于望闻问切的一般程序，总是先切脉，再望、闻后，对患者说出其病症，得到病人认同后才开药，准确率在90%以上；如果病人不认同，他再切脉并观察相关部位，待医患双方统一认识后才开药。

梁先生行医，不图名利，对病人一视同仁，慕名求医者遍及冀鲁豫三省十几个县。他一生带徒多人，均有成就。先后任聊城市医联会主任，山东省中医学会理事、聊城地区医院中医科主任等职。

医术：

善治瘟疫时疫 用方简洁灵验

古棚街北部路东，民国年间住着一位中医叫王省三，他先后在聊城、济南行医。王省三的学识很丰富，尤其精于对瘟疫、时疫的诊断，药方简洁但治病灵验。对贫困病人绝没架子，更不收取诊金。

叶家园子街叶氏家族中，精通中医的代不乏人，先后有叶兰、叶锡龄、叶俊昌、叶嗣高等。叶嗣高(1857—1925)，光绪二十年(1894)赴陕西为候补县丞。二十六

年(1900)在太原漕粮房任职。这年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光绪帝和西太后慈禧逃往西安，途经太原时慈禧患病。叶嗣高被推荐为慈禧诊病，慈禧病愈后封其为延山县知县。不久又应召进京，任太医院御医，旋升为遵化州知州。后在天津袁世凯府中听差，进京见驾，升为候补道台。辛亥革命后，回乡行医。

文明街的傅斯侨，字润臣，曾居古楼北相府街。同治年贡生，官至直隶州知州。医术高超，县志上对他有记载。傅斯侨深恶官场腐败与黑暗，弃官回乡行医，名闻乡里。同治十二年(1873)到济南行医，山东巡抚等省城官吏常问诊于他，其名望誉满泉城，后卒于济南。

清朝末年，叶家园子街的西首路北，有一个中医世家，数代行医，以孙作舟、孙履平父子两代最负盛誉。孙作舟，字孚臣，青年时随父学医，后行医40余年，治愈危重病人不可胜数。曾被聘为中学校医，倡导学生讲究卫生，预防疾病。他辛勤培育人才，先后收徒13名，晚年仍在故宅接诊。

孙履平，早年继承家传医术，1959年开始在聊城市人民医院工作，任中医科主任。擅长内科、妇科。医德高尚，不论贫富富贵有求必应。晚年著有《孙履平医案》、《中医内科常见病诊治浅识》等。

东关大街路南有一位擅长骨科的刘德成先生，他对跌打创伤诸症颇有研究，患者经其治疗后立即见效。其子刘洪祥继承了家传正骨技术和优良医德，成为当代聊城正骨名医，20世纪70年代被聊城中医院慕名调入。

民国年间，东关大街“仁和堂”药铺聘请博平县姜春暄当“坐堂先生”。姜先生，名树堂，因蓄浓密的八字胡，人称“姜胡”。他是清末秀才，初以教书为业，后弃学从医。他不但具有较好的医术，而且擅长撰写诉状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返回故里博平。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6年到冀鲁豫军区六(运东)分区任军医。1947年7月，在阳谷县郝楼村一次与反动武装的战斗中牺牲。

西医：

丈夫治病救人 妻子昼夜接生

西医李士杰，自幼在基督教会学习西医，1938年与妻王淑兰从濮阳教会办的“中华护士学校”毕业，回聊后在驴市口路北创办“大卫医院”。1947年聊城解放后，又开“大卫诊所”。1950年，聊城县首次对地方开业的中西医生业务技术考核，李士杰获得“西医师”证书。

1952年，李士杰加入聊城专区人民医院，同年置宅于安乐巷南首原金家油坊处。李士杰慈心向善，治愈过无数患者。解放聊城战役中，曾积极医治受伤的解放军战士。1969年，原地区人民医院“清理阶级队伍”，李士杰被诬“利用教会医院害人”，含冤投河自尽。1979年平反，恢复名誉。王淑兰自幼失去父母，被教堂收养，十几岁即从事护士工作。1938年，与夫开办诊所，以新法接生为主，兼治其他疾病，收学徒4名扩充为“大卫医院”。1953年，城关区私人诊所合并成4个联合诊所，王淑兰在第三诊所工作。

民国到解放初期，由于群众缺乏卫生科学知识，多用传统接生方式，产妇感染率和婴儿死亡率都很高。王淑兰注意宣传新法接生，她的仁善和厚道赢得了人们的信赖。无论风里雨里，无论白天黑夜，随叫随到，服务热情周到。王淑兰作为较早聊城实行新法接生的医护名师之一，事迹载入《聊城市卫生志》。其医术和医德至今口碑载道，令人追思。与王淑兰一样，从事接生的还有王桂云、东关街人，曾在民间有广泛影响。

《东昌老街巷》记载，西口南街路东，曾住着一位黑子斌医生。民国二十二年(1933)，他到东白衣堂街天主教堂内的教会医院做医疗工作。1947年3月，筑先县人民医院在古楼西街路南成立时，他担任院长，同时负责全县药政工作。1948年6月，该院撤销，他进入哈利生二分院工作。后在古楼东街路南原第四联合诊所工作至退休。



东昌名医爱读的中医名著《医宗金鉴》